第一章 緒論

一、研究動機

臺灣的糖業和臺灣的歷史幾乎一樣的悠久，而且這個產業在臺灣的貿易——特別在國際貿易方面，有著獨特而重要的地位。一直到 1959 年時它還是臺灣外匯收入最主要的來源[1]。雖然可以將其定義成只是農產品的加工業，但其實甘蔗種植和砂糖製造一直有著密切的關係，必定要在其中設計出一套的制度才能將其連結起來，所以糖業對於社會的結構本來就有一定的影響。到了二十世紀之後，砂糖製造更是朝向大工廠的生產線和大量製造的典型工業生產的方式進行。糖業對於社會形塑的力量已經被眾多的區域研究毫無疑問的實證了[2]，因此糖業的研究，可以說是要瞭解過去臺灣的社會演變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切入點。

不過臺灣糖業本身的變遷，卻留下了許多並不是確切清晰的問題，比如說在荷蘭到明鄭時期興盛的與日本的砂糖貿易爲何後來變成無聲無息？而整個清代在開港以前的糖業發展的態勢其實也只留下很模糊的輪廓。開港之後市場的擴大爲何沒有引起任何的技術革新也令人費解？整個清代，臺灣糖業的生產形態和內部的商業網絡幾乎沒有明顯的變化，爲何開港後市場的擴大也不能產生任何有效的刺激呢？更重要的是在二十世紀初期，糖業改良政策的推行又是在什麼情況下成功，它的成果要如何評估呢？過去的研

[1] 在1950年臺灣砂糖的出口占出口總值的74%，1959年時為41%。見陳正祥，《臺灣地誌》（臺北:南天，1993.10），609。

[2] 主要是由國立師範大學地理系對於一系列各區域糖業與社會的研究，在此只舉一部分例子：楊淑卿，〈北港區域之形塑與演化〉(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1993.6)。王怡芳，〈日治時代虎尾市街的出現與成長〉(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1999.6)。陳美鈴，〈嘉義平原的聚落發展--1945年以前〉(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博士論文，1999.6)。林聖欽，〈日本時代臺灣糖業的不均衡發展:以鹽水港地區的農家生計差距擴大為例(1896-1930)〉(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博士論文，2001.9)。林思佳，〈臺灣糖業發展和地方特性之形塑-以高雄縣橋鄉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6。由歷史系所寫的論文則涉及了產業對菁英分子的影響如莊天賜，〈日治時期屏東平原糖業之研究〉，中壢：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6。

究總是給人這純粹是資本的力量的印象，然後就直接跳躍到分析糖業改革後的資本主義化對於社會結構和階級的影響。這種方式在方法上是否妥當是一回事，但是它對於整個糖業變遷過程的理解肯定沒有什麼幫助。因此本研究主要的關切點在於臺灣糖業從停滯到成長的詳細過程，追索其背後的動因，特別是在社會背景變化最迅速的清末開港後到日治時期糖業改良政策推行的詳細過程，並且嘗試理瞭整個變遷過程對於甘蔗的生產者——蔗農的實際的影響。

二、研究回顧

糖業的研究和糖業的本身一樣不僅在臺灣，在國際上也一樣有著長久而豐富的歷史。由於過去西方的糖產和熱帶殖民地直接相關，其研究也大都在討論糖業與殖民之間的關係[3]。不過 Mintz W. Sidney 的經典作品《Sweetness and Power》則不僅展示了糖業對於熱帶被殖民者積極上的面相，更討論了其對於大英帝國本身海軍和航運甚至其工業化的影響[4]。不過西方糖業的畢竟都是在大種植園制度(plantation)下所發展出來，這和臺灣，中國甚至是日本的糖業發展模式截然不同。

Sucheta Mazumdar 的作品[5]則詳細的討論了中國糖業技術演變的過程，指出其間並沒有如趙岡和陳鍾毅在棉紡織業上所聲稱的：因爲勞動力過剩而限制了技術的選擇的現象[6]，她認爲廣東糖業停滯的主因在於勢力強大的商紳階級掌握了市場和土地，因而攫取了大部分利潤，並且利用極高的利息控制了農民的生計[7]。但是在臺灣，特別在南部顯然沒有如此強大的紳商勢力足以控制市場，而且從買賣契約看起來，土地交易自由且頻繁，然而其停滯的情況和廣東糖業相比甚至是更加嚴重（參考圖 3-1）。Chin-Keong, Ng(吳振強)的作品[8]雖然主題是在討論福建商人如何在十七世紀末到十八世紀初在中國沿海建立

[3] 典型的作品如Eric R. Wolf著，賈士蘅譯，《歐洲與沒有歷史的人》（臺北:麥田，2003）。與Pal Ahluwalia, Bill Ashcroft, Roger Knight ed, *White and Deadly: Sugar and Colonialism* (Commac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Inc,1999).

[4] Sidney W. Mintz, *Sweetness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1986).

[5] Sucheta Mazumdar, *Sugar and Society in China: Peasants, Technology, and the World Marke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1998).

[6] 趙岡，陳鍾毅，《中國土地制度史》（臺北:聯經，1982.4），419-433。

[7] Sucheta Mazumdar, *Sugar and Society in China: Peasants, Technology, and the World Market*, 295-337.

[8] Chin-Keong, Ng, *Trade and Society: The Amoy Network on the China Coast 1683-1735*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1983).

起完整的商業網絡，而臺灣生產的砂糖則被認爲是這個網絡形成的關鍵的貿易項目。但是其卻指出一個令人不太能置信的砂糖貿易數量[9]，這固然襯托這個網絡驚人的力量，但是卻讓人難以解釋其後在乾隆年間的太平盛世，這個貿易爲何無法發展，甚至是大幅的衰退（根據其估計的數量）。

有關臺灣糖業本身的研究，在開港時期之前時期，莫過於學者唐立（クリスチャンダニエルス）重要的論文〈清代臺灣南部における製糖業の構造--とくに一八六十年以前を中心として〉[10]。這篇論文從契約文書出發，敘述了如同臺灣地權演變，實權從大租向小租移轉一般，砂糖的生產工具——糖廍——的經營權也逐漸自大租主手上轉向小租主和現耕人控制。本篇論文是糖業的研究中，少數把焦點完全放在蔗農身上而討論其處境的文章。但是就其所引用 1751 年的合約字，經營權似乎本來一開始就是由現耕人運作[11]，只是在後來連所有權都由現耕人擁有，但是這倒底算不算是地位的上升，卻是值得進一步思考。而且假使這真得是組織型態的變革的話，爲何一點也沒有改變生產的技術這個疑問，也不能從作者的論文中得到線索。

在開港之後的糖業引起更多的討論，其中最負盛名者莫過於林滿紅的《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不過林著的重心在於貿易的變遷，對於產業內部結構的描述過於依賴海關以及領事官員片面的敘述[12]。有些推論顯得太過於迅速，所建立的產業和社會經濟變遷間的關係並不能讓人完全信服。而且林著對於糖業無法產生技術革新這方面，也只能提出模糊的文化因素解釋。唐立也曾對開港之後的臺灣糖業有所論述[13]，強調開港之後由於外國資本和外國銀行的金融關係的建立，前貸金制度擴大而使得蔗農陷入更深的債務之中。不過現今已經可以確認前貸金制度最盛行的打狗區域的主導者——和興公司——純粹是臺灣人的資本，其勢力的擴張和外國金融資本介入臺灣這件事關係不大（參見文本第三章第二節第三小節對輸出商的討論），而在打狗以北的前貸金制度則並沒有證據顯示有擴大的傾向，作者過於相信原熙氏在 1896 年匆促的情況下的調查[14]，可能是

[9] Chin-Keong, Ng, *Trade and Society: The Amoy Network on the China Coast 1683-1735*, 133. 作者估計1720年時臺灣砂糖輸出就達到了百萬擔之多。

[10] クリスチャン ダニエルス（唐立），〈清代臺灣南部における製糖業の構造--とくに一八六十年以前を中心として〉，《臺灣近現代史研究》，5號（東京:綠蔭書房，1984.12.30）：47-113。

[11] クリスチャン ダニエルス（唐立），〈清代臺灣南部における製糖業の構造--とくに一八六十年以前を中心として〉，《臺灣近現代史研究》，5號，65-66。

[12] 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臺北:聯經，1997.4）。

[13] クリスチャン ダニエルス（唐立），〈清末臺灣南部製糖與商人資本(1870-1895)〉，《臺灣風物》，50. 1（臺北，2000.3）：129-162。

[14] 原熙，〈糖業調查書〉，《臺灣總督府殖產史料彙編(明治28年至明治41年)》，（南投: 臺灣省文獻會，2000.5.31）：1-75。調查書中不正確的認為和興公司有洋商的資金，並且以為其資金高達百萬圓之譜。

造成誤判的主因。此外莊英章和陳運棟的作品則描述了頭份地區的一個糖廍的經營和生產的許多細節[15]，這使吾人對於一般糖廍的生產成本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只是這種墾戶自行設立糖廍，由自己開墾地上供應甘蔗原料，利用所擁有的大量人力進行甘蔗製造的形態，對於南部的蔗產區而言，只是極少數的例外。

對於日治以來的臺灣糖業的研究，不能不提的自然是矢內原忠雄開創性的作品——《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16]，以及涂照彥幾乎是同名的作品《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17]。這兩篇作品主要屬通論的性質，然而概念範疇稍嫌過於寬鬆，加上已有不少評論[18]，於此不再重述。而在日治初期新式糖業制度建立的階段的論述，則有森久男[19]以及黃紹恆[20]的作品。森久男的作品的焦點在於臺灣總督府糖業政策的展開，對於總督府的決策過程，財政狀況均有完整的描述。而黃紹恆則對於臺灣本島資本家在糖業改良政策的初期投入製糖業的情況有詳盡的敘述，兩者之間可說很有很多可以相互補充之處，不過兩者的分析似乎都著重在製糖企業的外部環境的分析，對於其內在的組織及動力較少討論到，而且對於最基層的蔗農的情形，也是較少著墨。至於其它如柯志明[21]，張漢裕[22]等人的作品則是將重點放在糖業改良政策基礎建立之後的情形，因此不再贅述。不過在此所要強調的是，研究日治以後糖業的作品，對於清末以來臺灣糖業所形成的情勢的處理，往往有想當然爾的推測，對於糖業進展很容易有理所當然的想法。不僅對於清末糖業發展出來形勢並不是有很清晰的了解，甚至對糖業改良初期過程（1902-1912 年）也輕易的乎略過去，本研究所要做的，正是要補足這方面的不足之處。

---

[15] 莊英章，陳運棟，〈清末臺灣北部中港溪流域的糖廍經營與社會發展：頭份陳家的個案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期56（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3）：59-110。

[16] 矢內原忠雄，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臺北:帕米爾書店，1985.7）。

[17] 涂照彥著，李明峻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臺北:人間出版社，1999.2）。

[18] 典型的評論如在柯志明，《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臺灣的發展與從屬》（臺北:群學，2003），10-15。和黃紹恆，〈從對糖業之投資看日俄戰爭前後臺灣人資本的動向〉，《臺灣社會研究》，23（臺北，1996.7）：85-87。

[19] 森久男，〈臺灣總督府の糖業保護政策の展開〉，《臺灣近現代史研究》，1號（東京:綠蔭書房，1978.4.30）：41-82。

[20] 黃紹恆，〈從對糖業之投資看日俄戰爭前後臺灣人資本的動向〉，《臺灣社會研究》，期23：83-146。

[21] 柯志明，《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臺灣的發展與從屬》。

[22] 張漢裕，〈日據時代臺灣經濟的演變〉，《經濟發展與農村經濟》，（臺北:張漢裕博士文集出版委員會，1974.8）：395-500。

三、史料分析

開港之前的糖業史料，在《臺灣文獻叢刊》之中僅有片斷的記載。主要還是從文書契約中才能求取較爲深入的資料。雖說近年來各地大量蒐集古文書，也有不少的出版品，但是有關蔗園的契約最多者仍是〈臺灣公私藏古文書輯本〉中第五輯和第六輯的鄭氏文書，以及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所藏〈鳳山張氏文書〉，與臺灣文獻館所藏的〈臺南契字〉等分別提供了阿緱（屏東），鳳山燕巢（高雄），臺南佳里地區歷年的蔗園價格及交易情形。

有關開港之後的史料，最爲完整的自然是由當時海關關員所整理出來的海關表以及各年的海關報告[23]，此外英國領事館官員的領事報告也可做爲補充[24]。當時在臺灣的美國記者後來成爲美國領事的 James W. Davidson 也提供了不少的記載[25]。比較遺憾的是怡和洋行留下的檔案在使用上仍然極不方便[26]。這些記錄雖然提供了準確的數據和冷靜的觀察，但是因爲語言和文化的隔閡，很容易流於表面。另一方面由日本統治初期發起的舊慣調查會所留下的調查資料如《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二部--調查經濟資料報告》和《臺灣糖業舊慣一斑》以及《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中的部分調查報告等則對於臺灣舊有糖業的產業結構較爲注意，也是當時重要的史料。

日治之後的階段，由於《臺灣糖業統計》的資料大多是在 1911 年之後，所以日治初期大部分的數據要仰賴《臺灣總督府統計書》以及《臨時臺灣糖務局年報》上的記載。雖然有關糖業的數據可以說非常齊全，然而有關糖廠與糖廠間以及糖廠與蔗農間種種的交互關係，則大部分仰賴《臺灣日日新報》、《臺灣協會會報》以及當時糖業的專業雜誌《糖業》。比較大的缺憾是在總督府公文類纂中的臨時臺灣糖務局的原始檔案並沒有開放，此外有關蔗農的直接史料畢竟太少，往往只能從數據中去猜測其處境和想法，但也只能盡力而爲了。

---

[23] 黃富三，林滿紅，翁佳音編, *Maritme Customs Annual Returns and Reports of Taiwan, 1867-1895*, 臺北：中央研究院臺史所籌備處，1997。

[24] Robert L. Jarman, *Taiwan Political & Economic Reports 1861-1960* (Slough: Archive Editions,1997).

[25] James W. Davidson, *Island of Formosa: Historical View from 1430 to 1900* (Taipei: Book Word Co.,).

[26] 黃富三，〈簡介怡和洋行檔中的臺灣史料〉，國學文獻館編，《臺灣地區開闢史料學術論文集》（臺北: 聯經，1996.6），237-247。Jardine, Matheson & Co's Archives簡稱為JMA，其中有不少發自打狗臺南的商業信函，相信對進一步釐清糖業貿易的結構很有助益。

四、研究方法及章節安排

由於本研究所關注的主題在於臺灣糖業由停滯到成長的過程，在理論上則傾向於新制度史的取向，特別著重交易成本、企業組織、財產權以及政府機構之間的詳細作用[27]。但同時也對於新古典學派的經濟學所強調的價格功能和獲利性的分析加以特別的注意[28]，希望這些理論配合重視敘事和史料正確性的歷史學方法，可以使吾人對於這段臺灣糖業轉變最大的階段能有更爲深入的理解。

在章節安排方面，大致上依照時間的次序，第二章敘述荷蘭時代開始至清末開港之前臺灣糖業的概況，主要處理的是糖業貿易的轉變和政府的態度，最後則利用古文書的資料說明蔗農的基本狀況。第三章則描寫開港之後的糖業情形，首先對海關貿易以及戎克貿易的情形，其次則討論輸出商與中間商的結構，特別是他們與糖廍之間的關係。接著則是討論舊式糖廍的運作以及當時蔗農的經濟生活。第四章的重點是糖業改良政策推行的經過和成果。介紹糖業改良的推廣單位——臨時臺灣糖務局——如何促進資本的投入和技術推廣，並且評估其成就以及不足之處。然後則是對另一個生產組織——改良糖廍創立的經過和成本的分析。在描述臺灣糖業如何從 1911 年至 1912 年的大風暴後恢復元氣之後，最後則介紹在糖業改良之後，處於製糖會社和原料區制度下的蔗農的處境。

---

[27] 如Douglass C.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Douglass C. North著，劉瑞華譯，《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臺北:時報文化，1995.2）。以及Oliver E. Williamson, Sidney G. Winter ed, *The Nature of the Firm: Origins,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等著作。

[28] Donald N. Meloskey, "The Economics of Choice: Neoclassical Supply and Demand," Thomas Rawski ed., *Economics and the Histori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122-158.